



伯希和传

Philippe Flandrin

[法] 菲利普·弗朗德兰 著

一梧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aul Pelliot

伯希和传

Philippe Flandrin

[法] 菲利普·弗朗德兰 著

一梧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Les Sept Vies du mandarin français : Paul Pelliot ou la Passion de l'Orient

Philippe Flandrin

© Editions du Rocher,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希和传 / (法) 菲利普·弗朗德兰 (Philippe Flandrin) 著; 一梧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95-8763-6

I. ①伯… II. ①菲… ②—… III. ①伯希和 (Pelliot, Paul 1878-1945) —传记

IV. ①K835.6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111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05千字 图片: 19幅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归还？道歉？

1984年夏，正当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逐渐褪淡之际，我参观了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敦煌千佛洞。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洞窟入口处有一块介绍牌，上面揭露了一个名叫伯希和的法国人犯下的“罪行”。此人在1908年“殖民主义鼎盛时期”通过贿赂看守道士劫掠了敦煌藏经洞，带走三千册汉文、印度文、藏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写本和手卷，以及木板画、彩幡、白画、彩绘、雕塑等。这些出自7—11世纪优秀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僧人之手的作品堪称艺术和考古瑰宝，价值不可估量。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国著名僧人玄奘的作品。伯希和的行径简直是十足的盗窃。

我回到法国后，开始了解这个被中国管理员称为“强盗”的人的有关情况。我猜想他应该在某个阴暗的监狱里度过余

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巴黎，我了解到这位保罗·欧仁·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兰西学院院士（académicien）和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教授。他是汉学权威，其位于巴黎福煦大街的豪华寓所中摆满了东方古董，他竟然是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汉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将其视为大师，甚至是伟人。他从敦煌带走的写本、手卷、绘画和文物根本没有被海关稽没，而是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和吉美博物馆的展厅里。真可谓无限风光！

我在巴黎见过伯希和的同行和学生。对他们而言，伯希和远非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偷盗者。他直到 1945 年去世之前，从未停止研究从敦煌带回来的著作和写本，并不断发表学术成果。此外，他还留下数量惊人的笔记、文章和著作，其中包括对古汉语、回鹘语、蒙古语、吐火罗语写本的翻译、评论，以及研究成果。这项整理、注释工作迄今仍未完成。他扩展了世界对亚洲的认识和理解，其贡献可谓空前绝后。他带走敦煌藏经洞中的精品，对它们构成一种保护，因为十二年之后，藏经洞惨遭哥萨克囚徒洗劫。由此可以说，伯希和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但这种论调难以说服伯希和的诟病者。在这些人眼中，即使以科学之名犯下的罪行也不能掩盖犯罪的事实。1908 年，敦煌并非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中国政府也从未允许伯希和肆意攫取藏经洞中刚被发现不久的藏品。虽然伯希和的研究对象是

丝绸之路史，但他所采用的研究资料上也承载着对中国历史的记忆，这一点怎能被忽视？这些人会说，只可惜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欺辱，伯希和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如果他仅仅想研究藏经洞中的瑰宝，为什么不在这片丝绸之路的绿洲上安营扎寨？

说到底，这就是殖民主义侵略。今天的柬埔寨、阿富汗或伊拉克遭受侵略后，不同样也经历了大规模劫掠吗？

如今，中国人比以前更加市场化，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珍宝在西方国家的画廊或博物馆展出时，只能说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源于他们知道仅仅在一个世纪前，自己的国家连自我保护的能力都没有。

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写本和绘画？是否应该向中国道歉？至少从道义上讲，这个问题值得一提。

这也正是我希望了解本书主人公的原因所在。

伯希和是一名学者，完全有能力研究并妥善保管带回法国的珍宝。他在敦煌、顺化、北京和柏孜克里克也正是这样做的。同样，他以低廉的价格在越南、中国和蒙古的书店里购买了数万册写本和书卷。今天，几乎所有这些著作和资料都可供研究者使用。

然而伯希和毕竟生活在法兰西殖民帝国时期，那个时代的学者甚至认为亚洲只是科学研究对象，殖民者是师傅，原住民是徒弟。当时世界上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分，无论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葡萄牙，还是美国，殖民帝国的财富当然

应该在宗主国保存、展览和研究。这样的世界观经常使对被统治民族的掠夺、剥削和奴役变得冠冕堂皇。

今天，至少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不少民族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标志、印记和完整记忆，相关实物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前殖民主义强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保险箱里。一些国家提出归还的要求，其中包括中国对敦煌文物的要求。

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珍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伯希和是谁？他的目的何在？他一生中经历了怎样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联系了伯希和的后人，发现他们对他知之甚少。我查阅了伯希的朋友、同事以及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述，发现他们虽然知道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但对其生平经历却不甚了了。

我越深入研究，越发现伯希和具有多面性，正如在印度和中国经常见到的多头神仙或多头魔鬼那样。伯希和不仅是学者、强盗，还是军人、政客、旅行家、赌徒、特务和殖民者。此人恰似佛陀和大黑天神，收集的不仅仅是书卷，更是生命，而这一切当然打着为了法兰西帝国荣誉和科学研究的旗号。

到底是否应该归还？发言权在法国权威汉学家伯希和那里。

目 录

前言：归还？道歉？	i
第一章 顺化	1
第二章 北京（一）	31
第三章 北京（二）	57
第四章 吴哥	87
第五章 丝绸之路	103
第六章 图木舒克	131
第七章 都勒都尔·阿护尔	149
第八章 敦煌	165
第九章 巴黎	189
第十章 东西伯利亚	217
第十一章 福煦大街	245
译后记	301

第一章 顺化

“发迹前的文人，正如潜龙在渊，等待着甘霖。”

1899年10月23日，马赛若列特港（bassin de la Joliette），“大洋洲人”号（L'Océanien）邮轮收锚离港。它长长的白色船体映衬在法兰西火轮船公司（CMM）灰色的办公楼上。一缕缕黑烟从并排着的两个烟囱中冒出，嗡嗡的汽笛声在港口上空回荡。人们挥动着手帕。伯希和紧紧抓着船栏杆，不用向任何人说再见。在此之前，他怀着解脱的心情在巴黎与家人拥抱告别，然后坐上了夜间的火车。终于自由了！远方独自一人的生活吸引着这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他的目的地是印度支那西贡，那里是法国殖民地，是远东明珠。

法国人用四十年时间占领了交趾支那¹、柬埔寨、安南²和老挝，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南部省份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法国在上海、天津和北京设有租界。1860年以来，法国和俄国、英国、日本一起跻身在远东的列强之列。1897年时的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³认为安南和东京⁴已经实现和平。加利埃尼将军⁵和利奥泰将军⁶推崇的“油点政策”(politique de la tache d'huile)，即对反抗地区实施政治和军事分区控制，并有选择地进行镇压，取得了成效，至少暂时如此。1885年越南“勤王运动”引发了大规模民众反抗，战争幸存者和未被法国人关进监狱的人躲藏起来。从皇室到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员，要么遭到排挤，要么变得服服帖帖。各地仍有零星抵抗，但一时不会对强力的殖民主义秩序产生较大影响。从此以后，殖民者开始“改造当地社会”。按照法国在柬埔寨的驻扎官阿德玛·勒克莱尔(Adhémar Leclère)的观点，“土著必须向法国宗主学习，就像儿子向父亲学习那样”。

1 即南圻，在今越南南部、柬埔寨东南方一带。(如无特殊说明，本书页下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2 即中圻，在今越南中部。

3 保罗·杜美(Paul Doumer, 1857—1932)，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十三任总统(1931—1932)。1896—1902年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镇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加强殖民掠夺。1932年担任总统期间被刺杀。

4 即北圻，今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区。

5 加利埃尼将军(Joseph Simon Gallieni, 1849—1916)，法国元帅，1892年被派往越南北部进行殖民活动，认为征服是传播文明的一种手段。

6 利奥泰将军(Louis Hubert Lyautey, 1854—1934)，法国元帅，1894年在印度支那任职，是加利埃尼手下。

如此比喻……也就是说，被殖民者是小孩，是必须加以管教和约束的儿子，而教育过程将持续一段时期。由此可知，“大洋洲人”号邮轮 1899 年的航行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邮轮是个小社会，登上船的法国“宗主”们代表着宗主国的不同社会阶层。最上层的头等舱有九十多个位子，高级官员、行政人员、法官、银行家、种植园主、教士，当然还有军官等社会精英在那里享受着单间和客厅。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尽相同，有激进社会主义、法国行动党等极右翼、天主教派、共济会派等。在法国本土，世俗与宗教之争正如火如荼，两种势力水火不容，但在维护法兰西帝国伟大荣誉上却立场一致，很少有人企图质疑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二等舱有四十四多个位子，乘客身上散发着外省人辛勤而又贫微、吝啬而又狡黠的气质。这些科西嘉人、奥弗涅人、布列塔尼人希望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稳定工作，比如当警察，做小买卖或在咖啡馆当服务生；头脑灵活一点的想到了农业加工，比如生产橡胶、咖啡或茶。对这些人而言，印度支那是一片可以大干一场的乐土，他们梦想着在那里成为声名显赫的殖民者，然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三等舱有七十五个位子，挤满了贫苦农民、无业游民、小流氓和刑满释放的人。这是一帮无产阶级冒险者，为的是逃避在本国的悲惨命运。用不了多久，他们也能把自己当成上等人，当然，仅仅是在面对殖民地原住民时……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一定会好好享受。殖民地真是好地方，不仅可以让殖民者快速提升社会地位，还充满神秘的异国情调和各种情色诱惑，

让人浑身躁动。

那里有职位，有生意，有大大小小的利益可以捞取。有人变成百万富翁，比如西贡安全局长白朗（Belland）就靠橡胶发了财。但想成为英雄却不那么容易，不能再像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海军中校那样在 1860 年代率舰征服湄公河流域，也不能再像他的副手弗朗西斯·安邨¹那样效仿拿破仑时期的将军，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就擅自占领河内，更不能像里维埃（Rivière）船长和伯比奥（Bobillot）中士那样为征服东京付出生命的代价，成为烈士。如果对女人感兴趣，可以娶个妻子，建立个家庭，中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都行。在“大洋洲人”号上的乘客中，一部分人脑子里只想着如何逍遥自在，但另一部分白人殖民者怀揣着所谓的理想，希望把文明带给他们眼中落后、野蛮、原始的民众（还不能称之为人民）。他们自认为是信仰的传播者、战士和导师，到殖民地进行反对暴君统治的战争，一举改变当地的落后和无知。这些人以解放者自居。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所顾忌，因为法国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权都对他们给予支持。他们还要守卫印度支那，防止这片和平的港湾遭到周围的野蛮侵袭，抵御可怕的“黄祸”——人口众多的中国，甚至还要统治中国，否则它将闯入欧洲的大门。而在欧洲人脑海中，历史上大规模入侵仍然历历在目。

1 安邨（Francis Garnier, 1839—1873），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

1885年3月28日，令人生畏的李鸿章大人麾下的中国军队在谅山击败法军，布里叶·德·利斯勒（Brière de l'Isle）发回巴黎的电报唤醒了藏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恐惧：“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希望保卫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巴黎街头开始骚动，1870年战败的阴影重新浮现，仿佛阿提拉¹的幽灵。“中国军队似乎已经开始准备包围巴黎城了。”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这样写道^[1]。当天下午，克列孟梭²在众议院对茹费里³怒吼道：“我们再也不认识您了，我们不想再认识您了！”茹费里政府随即垮台。征服远方的印度支那，让那里的人们臣服，成为法国人的一种报复。丢掉阿尔萨斯和洛林十五年之后，在法兰西帝国的意识形态中，除德国之外又产生一个新的野蛮形象——应该趁早征服这些“黄种人”。

高棉、老挝、越南都有上千年历史，殖民者却统统不屑一顾地称之为“土著”。两千多年以来，印度婆罗门教和中国儒教在这里交融，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才有了东山文化铜鼓的独特纹饰和音质，才有了吴哥窟雄伟华丽的建筑，才有了顺化古城中的水族公园。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探险者们似乎通过它们看到了整个印度支那曾经的辉煌。是啊，顺化古城高大的城墙

1 阿提拉（Attila，406—453），古代欧亚大陆匈人最伟大的领袖，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对两国造成极大打击。

2 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人称“法兰西之虎”，第三共和国总理（1906—1909，1917—1920），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

3 茹费里（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1832—1893）法国共和派政治家，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1880—1881，1883—1885），任内推动政教分离，支持殖民扩张。

矗立于无边的大海和广袤的稻田之间，吴哥古城的岗哨背靠着陡峭的扁担山脉，倒映在辽阔的洞里萨湖中。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宏伟。茂密的森林如教堂钟楼般高耸入云，滔滔的洪水可以淹没整片村庄，高低起伏的山脉间经常有狗熊、老虎和大象出没。就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有一群人，他们是过着半游牧生活的山民，也擅长农耕，在越南语中被称为“野蛮人”。这种叫法将上百个不同起源、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民族混为一谈，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也充分显示了法国人对被征服者的无知。新来的殖民者对越南知识阶层了解多少？对高棉或老挝的僧侣和苦行者了解多少？对那里的经文、碑刻、典籍又了解多少？这些文字构成当地公法和私法的基础，即使仅为处理当地势力和西方列强的关系，也应该对略知一二。太平天国时期兴起的黑旗军在 1885 年中法战争中给予中国朝廷军队强大支持，法国真的了解这支军队吗？总的来说，法国人都知之甚少。此外，“法国宗主”受到当地或明或暗的抵抗，对原住民的看法自然不会太积极。

当地官员都是狡猾的骗子，商人都是小偷，农民都愚昧无知，苦力是最好吃懒做的贱民，反抗者都是疯狂的暴徒。法国殖民者提到被他们统治的人民时，总喜欢使用与昆虫有关的词汇，例如他们会用“蚁穴”、“爬满”之类的词描述人山人海。被统治者的历史和文化一文不值，他们只有完全融入法国文化，掌握法国语言，才能实现自我救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即使身处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得到殖民者

承认。被统治者已经开始全面了解统治者，尽管他们并不情愿成为统治者的学生。这样看来，在东京北部地区、安南山脉¹之间，在湄公河谷、扁担山和豆蔻山之间的这对冤家，倒是作为“师傅”的统治者显得更加无知。

盲目自大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结果只能是悲剧。1885年，顾思（de Courcy）将军因嘲弄越南皇帝而引发“勤王运动”，这是法国在越南殖民时期第一起全国性动乱。1894年，出于同样原因，驻扎官汤姆逊在柬埔寨引发起义。法国人对印度支那历史、传统、文学、宗教和风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时代仍在发展。1897年，保罗·杜美出任首任印度支那总督。他是一个现代派。殖民征服时期已经过去，殖民统治时期到来了。杜美希望在刚刚成立的印度支那联邦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他仿照法兰西共和国政治体制组建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然而印度支那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半岛，上面生活着三个民族：高棉人、老挝人和越南人。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操着澳亚语（austro-asiatiques）、南岛语（austro-nésiennes）或藏缅语，如今被统称为“山民”。

要想统治好和管理好，而不是被排斥在外，就要听懂多种语言，认识多种字母，了解当地不同的文明、历史以及传统。为实现长久统治，必须深入了解统治对象。正因为如此，荷

1 越南称“长山山脉”，老挝称“富良山脉”。

兰人于 1778 年在巴达维亚¹成立东方学会，英国人于 1784 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皇家亚洲学会，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学者们于 1809 年前后撰写了《埃及志》(*Description de l’Egypte*)。

而在印度支那，这方面工作尚未展开。1873 年，法国在西贡设立殖民管理培训学校，培养出菲拉斯特 (Philastre)、拉格雷、安邨、德拉波特 (Delaporte) 等不少人才，这些人的足迹虽遍布印度支那，但他们只是探险者。从 1883 年起，法国印度支那研究学会开始致力于研究当地农业、工业和商业问题，但取得的成果只是撰写了一些报告而已。只有运用科学手段，才能更好地了解印度支那，也才能使印度支那更加现代化，而当时所缺乏的正是科学手段。在法兰西公学，东方学学者雅克·达梅斯特泰 (Jacques Darmesteter) 在高的讲台上宣布，应该将当代东方（即从埃及到中国之间的地区）视为“科学研究对象”。以杜美总督为首的殖民当局所需要的任何科学领域，都可以放在殖民主义这个大实验室中。1898 年，杜美在印度支那成立地质所、巴斯特学院、医学院和隶属于法兰西学院的考古队。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西尔万·列维 (Sylvain Lévi) 认为，学习研究的时候已经到来，“耻辱的局面”已经改变，对刚刚臣服的殖民地居民和当地现状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结束。

杜美任命三十五岁的路易·菲诺 (Louis Finot) 为考古

1 今印尼首都雅加达。

队队长。此人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他的学识必将促进高棉研究，特别是占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菲诺的助手有路易·卡巴东（Louis Cabaton），三十六岁，伊斯兰学学者，马来西亚和荷属印度地区问题专家，负责研究中国南部和柬埔寨穆斯林人口；另一位助手是个军人，埃田·吕耐·德拉戎基埃尔（Etienne Lunet de la Jonquière）上尉，三十八岁，他在个人著作《东京考古学和人种学图册》（*Atlas arché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du Tonkin*）中列举了印度支那的历史古迹。一支新的殖民精英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其使命不仅仅是统治，还包括考察、研究和提供建议。撰写印度支那各民族历史，研究当地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任务也落在它肩上。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管理被殖民者。

对菲诺的队伍来说，现在只缺少一位汉语专家。但为什么是汉语专家，而不是越南语专家？后者毕竟是印度支那的第一语言。也许是因为长久以来，越南人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使用汉字，而欧洲传教士在 17 世纪根据拉丁字母创建的拉丁化越南语并未广泛普及；也许是因为中华文明是越南文明的起源，从研究角度讲，法兰西帝国对其更感兴趣。此外，法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汉学院，院长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人们也许会以为，加入菲诺队伍的将是一位满腹经纶、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但最终的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伯希和，他将有幸成为印度支那考古队中第一